甬上证人书院与清代浙东学派

金林祥

清代浙东学派，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素来受到人们的称誉和重视。对于这个学派形成的原因，有的学者曾分别从浙东优越的经济条件，良好的文化学术条件；以及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等不同的方面加以说明。应该说，这些学者的努力是正确的，也是很有必要的。但笔者认为：黄宗羲创立并长期主讲甬上证人书院，是清代浙东学派得以形成的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一、甬上证人书院的创立和讲学活动

甬上证人书院，又称甬上证人讲社，它是由著名学者和教育学家黄宗羲于康熙七年(1668)，在原来甬上讲经会的基础上创立的。

清初，甬上结社之风颇盛，故家子弟多结文社。例如陈自舜先是同洪晖吉等人结为“秋水社”，后来又与董允瑫、董允璘、陈锡嘏、陈紫芝等结为“澹园社”。万氏叔侄万斯大、斯备、万言等也组成了“文业之会”。万言说：“丙申(顺治十三年)、丁酉(顺治十四年)之际，世变粗定，余叔侄集郡中俊彦为文业之会。”①康熙四年(1665)，甬上又成立了“策论会”，参加者除上述文社的一些成员之外，还包括郑梁。策论会成立后最重要的一次活动，是在康熙六年(1667)春，联合甬上士人27人，在万氏叔侄引导下集体到余姚黄竹浦向黄宗羲拜师求学。②他们返回宁波后，即由陈赤衷发起，成立了讲经会。对此，黄宗羲季子黄百家在《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中说：“先生(即万斯同)约诸昆侄咸来黄竹浦，问学于先遗献，归而为讲经之会。”郑梁在《怡庭陈先生行状》中亦说：“丁未(康熙六年)同受学于黄门，因同倡讲经之会于甬上。”讲经会成立后，他们一反自明中叶以来“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的讲学风气，认真研读儒家经典。这在清初的宁波，竟横遭非议，个别“以骂坐自喜”者，甚至还“间出违言”。在此情况下，适在同年9月黄宗羲恢复绍兴证人书院，并亲自“主教事”。消息传到宁波，甬上讲经会诸子为之振奋，他们邀请他也来“主鄞城讲席”。次年3月，黄宗羲欣然应邀至甬上讲学。正如他自己在《董吴仲墓志铭》一文中说：“明年(即康熙七年)，余至甬上，诸子大会于僧寺，亦遂以证人名之。”于是甬上证人书院便正式创设。

由于清统治者害怕人民利用书院传播民族思想，开展反清活动，曾明令禁止民间“别创书院”。因此，甬上证人书院这所民间的私立书院，办学条件十分简陋，甚至没有固定的院址和讲堂，讲学活动只能假僧寺，或学生的住家、别业、祠堂等地轮流举行。然而，就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甬上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却颇有特色。

书院讲学强调穷经、读史和经世。黄宗羲指出：“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

③全祖望亦记载说："先生始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④由此可见，甬上证人书院强调穷经、读史和经世，是为了改变自明中叶以后已成积弊的空疏浅薄的学风，这是黄宗羲从明朝灭亡的教训中悟出的重要学术思想，在当时使人耳目一新，颇为他的甬上学生所欢迎，接受。

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黄宗羲把经术列为甬上证人书院的主要讲学内容。他的高足李邺嗣说："黄(宗羲)先生教人必先通经，使学者从六艺以闻道。尝曰：'人不通经，则立身不能为君子；不通经，则立言不能为大家'。"⑤因而甬上证人书院在黄宗羲主讲期间，元元本本读毕《诗经》、《易经》和《三礼》。为了真正读懂和理解经书，他们也参考汉儒贾谊、马融、卢植、郑玄，以及宋以后的学者黄东发、吴草庐、郝京山等研究经学的成果。当然也学习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的经学著作。据郑良回忆，他于康熙六年(1667)5月13日初次面谒黄宗羲时，"先生手授以《子刘子学言》、《圣学宗要》诸书"。⑥与重视穷经相联，史学也是重要的讲学内容。黄宗羲高足、史学传人万斯同，在《寄范笔山书》一文中说："吾辈既及姚江之门，当分任吾师之学，……将来诸经之学，不患乎无传人，惟史学则愿与吾兄共任之。"除经学、史学之外，黄宗羲还讲授文学。万言记载说："吾师梨洲先生之倡道于甬东也，甬之士从而游者数十人。讲席之暇，先生取宋、元、明以来未经表暴之文百余家，手为划画，以授之吾党。"⑦此外，还有天文、地理、数学等自然科技知识。万斯大的儿子万经在《寒村七十寿序》中说得明白："维时经学、史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西测量推步之学、争各磨励，奋气怒生，皆卓然有以自见。"

由上可见，甬上证人书院的讲学内容可以概括为以经术为本，辅之以史学，统之以文学，以及天文、地理、数学等，其目的在于"经世"。这在当时颇具积极意义，使明中叶以来空谈心性，而卑视经世实学的"讲堂痼疾，为之一变"。

甬上证人书院采取的是研究式的教学方法。李邺嗣说："先从黄先生所授说经诸书各研其义，然后集讲，黄先生时至甬上，则从执经而问焉。"⑧很明显，这种教学方法具体包括各研其义、集讲和问难这样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并逐步递进的环节。所谓"各研其义"，就是学生必须各自独立地研究黄宗羲"所授说经诸书。"，不仅要认真研读本经，而且还要"尽搜郡中藏书之家先儒注说数十种，参伍而观"，经过综合比较，取其"自然的当不可移易者为主，而又积思自悟"。在各人作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定期举行集讲。所谓"集讲"，就是学生集体讨论，互相诘难。关于集讲的时间、地点与形式，李邺嗣写道："一月再集。先期于某家，是日晨而往，抠衣登堂，各执经以次造席。先取所讲复诵毕，司讲者抗首而论，坐上各取诸家同异相辩析，务择所安。"⑨这里所说的"司讲者"，往往由对经学有研究的学生担任。如陈赤衷是甬上讲经会的创始者，又"汲古穷经"，因而"常为都讲"。由于集讲是在各人作了认真准备的基础上进行的，讨论时又畅所欲言，无所顾忌，因此，常常能够提出一些新见。正如黄宗羲所说："发先儒之未发者，尝十之二三焉。"⑩所谓"问难"，就是学生在自学过程中，或是在集讲中产生的疑难问题，向黄宗羲请教，"执经而问"。黄宗羲对于学生的问难，总是循循善诱，积极开导，如果学生有不同见解，他也不是强求他们一定要接受自己的观点。例如，陈锡嘏对于黄宗羲的格物之论，就"颇不尽同"。又如，董允璘赞同王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法，而怀疑刘宗周"意为心之所存"的思想，作《刘子质疑》向黄宗羲请教，黄宗羲撰《答董吴仲论学书》解释，但不为董允璘所接受，仍保留原来的看法。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黄宗羲在甬上证人书院所采取的教学方法，贯串着一个基本

精神，即强调学生的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学生在自学时，不专主一家经说，而"参伍而观"，"积思而悟"；在集讲时，也不唯司讲者是从，"各取诸家同异相辩析，务择所安"；即使对于黄宗羲自己的答疑，也不主张学生一味盲从。学生在这样一种比较自由的学习环境中，就能够各就所长，自由发展，这是甬上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康熙十四年(1675)秋后，黄宗羲结束了在甬上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自康熙七年三月创立书院，至此结束，前后历时八年。在此期间，黄宗羲为浙东培养出了众多人才，笔者经过考证，目前已经发现有姓名者为 65 人。⑪

二、甬上证人书院与清代浙东学派

清代浙东学派，是一个以地域定名的清代学术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均是宁波府和绍兴府的人。这是与黄宗羲在甬上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密切相关的。换句话说，正是由于黄宗羲所从事的教育活动，为清初宁波、绍兴地区培养了一批史学、经学、文学等方面的人才，他们继承和发展了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转相传授，终于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学术流派。因此，笔者十分赞同这样一种见解："在黄宗羲的思想和学术风格的熏陶下，一个以甬上证人书院子弟为主力、其流风被于浙东乃至全国，其学脉传于乾嘉乃至清末的清代浙东学派形成了。"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黄宗羲在甬上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孕育了清代浙东学派。具体来说，突出地表现为：

1，培育了清代浙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凡是一个学派，总有其代表人物，成为本学派的支柱。有关清代浙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虽然目前学术界的看法不完全相同，但下面这四位却是大家所能共同接受的，他们是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和章学诚。

黄宗羲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创者，这素来为学术界所公认。章学诚在《浙东学术》篇中说："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州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得更明白："清初讲学大师，中州有孙夏峰，关中有李二曲，东南则黄梨洲。……三先生在当时学界各占一部分势力，而梨州影响于后来者尤大。梨洲为清代浙东学派之开创者"。由此可见，黄宗羲开创清代浙东学派，其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及门弟子。早在顺治十六年(1659)，他就到余姚化安山受业于黄宗羲。在甬上证人书院中，他虽然年龄小，但同学在学习中"遇有疑义，辄片言析之"。⑬他"深于经"，兼工名理与古文辞，而尤以史学著称于世，是黄宗羲在史学方面最有成就的学生。黄宗羲在列举甬上学生的高足时，首列"万季野之史学"。⑭万斯同"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康熙十八年(1679)，应监修明史徐元文之邀，以布衣参史馆，不署衔、亦不受俸。诸纂修稿子写成后请他审阅，他阅后提出应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入，或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闻者如言而去查阅，"无爽者"。他前后在史馆历时十余年，最后卒于京邸王鸿绪明史馆，为修《明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梁启超说"梨洲门下传授他的史学者，是万充宗的兄弟万季野。"称万斯同为浙东"第二"史学大师，这是颇有道理的。

全祖望是黄宗羲的私淑弟子。《清史稿·全祖望传》称：他"生平服膺黄宗羲，宗羲表章明季忠节诸人，祖望益广修枌社掌故，桑海遗闻以益之，……宗羲《宋元学案》甫创草稿，祖望

博采诸书为之补辑，编成百卷。"在清代浙东学派中，全祖望是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因此，梁启超称全祖望是黄宗羲、万斯同之后的"浙东第三位史学大师。"钱穆也说全祖望"上承南雷、二万、下启二云(即邵晋涵，号二云)、实斋，为浙东史学大柱"⑮。

章学诚是清代浙东学派的殿军。他继承了浙东学派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并把它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章学诚生活在所谓的"乾嘉盛世"。当时汉学盛行，学者埋头于名物训诂，而闭口不言现实。章学诚很不满意这种脱离实际的学风，大声疾呼学术研究必须经世致用。他在《说林》中说："学问所以经世，而文章期于明道，非为人士树名地也"。正是从这个思想出发，他发展了黄宗羲学者"必先穷经"，并"兼令读史"的思想，明确地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著名命题和"史学所以经世"的主张。他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⑯正因为章学诚与黄宗羲创立的浙东学派，在学术思想上有如此紧密的渊源关系，因此，学者们把章学诚视为清代浙东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完全是合乎情理的。梁启超说："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以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实为确论。

2,孕育了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风格

每一个学术流派不仅有其代表人物，而且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必定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风格，我认为以下二点是最基本的。

第一，主张学术经世致用。浙东学者主张学术研究应该以经世致用为宗，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宋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之学"。事实上，这二个学派也确实给黄宗羲的思想以很大影响。不过就清代浙东学派而言，主张学术研究应以经世致用为宗的学术风格，其源头在于黄宗羲。他说得很明白："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这就是说，在黄宗羲看来，无论是研究经学，还是研读史书，目的都是为了经世致用。可以说，经世致用既是黄宗羲开展学术研究的宗旨，也是他从事教育活动的方针。他的这一思想，为他的学生所继承和发扬，成为清代浙东学派最重要的特色。

万期同深得黄宗羲经世致用思想的精髓。他在《与从子贞一书》中明言："吾窃不自揆，常欲讲求经世之学。"万斯同讲求的经世之学，突出地表现为治史经世。因此，他治史重在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为后来者提供历史借鉴。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夫吾之所谓经世者，非因时补救，如今所谓经济云尔也，将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究其始末，斟酌其确当，定为一代之规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起而行耳。"研究历史是为了使后人能够"起而行"，这正是万斯同对黄宗羲学史"足以应务"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全祖望对于黄宗羲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集中表现为对明末忠臣义士和清初"隐逸之民"的表彰。他接过黄宗羲业已开始的"表章明季忠节"的事业，"广修枌社掌故、桑海遗闻"，撰写了许多表彰明末忠臣义士和清初遗民的碑传志表。全祖望的表彰文章，既保存了大量明末清初的珍贵史料，同时也将他自己的民族气节，以及对清统治者推行的文化专制政策的不满，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形之于文字。这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乾嘉时代的章学诚则更是在考据之风盛行的情况下，"不屑屑于考证之学"，大声疾呼学术研究必须经世致用，喊出了"学问所以经世"、"史学所以经世"、"文章经世之业"等时代强音，将黄宗羲开创的，经万斯同、全祖望继承与发展的清代浙东学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第二，擅长史学。黄宗羲创立的清代浙东学派，在史学、经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都

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学术界所称道。例如，梁启超就十分推崇全祖望的文章。曾说："若问我对于古今人文集最爱读某家？我必举《鲒埼亭(集)》为第一部了。"然而，相比较而言，清代浙东学派对后世贡献最大、影响最显著的，还是在于史学。章学诚曾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⑰

清代浙东学派擅长史学，不仅肇基者是黄宗羲，而且他治史的一些基本特点，也影响了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他们所继承和发展，并从史学理论上给予总结，形成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高峰。例如，黄宗羲重视学术史的研究，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后，完成了《明儒学案》一书，对明朝二百七十多年儒学，尤其是王学的发展演变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学术思想史专著。诚如梁启超所云："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晚年，黄宗羲又开展了对宋、元学术史的研究，不过仅成十七卷而卒。黄宗羲重视学术史研究的特点，为全祖望所继承。他接过了黄宗羲未竟的事业，研究宋、元学术史，自乾隆十年(1745年)至十九年(1754年)，前后整整用了10年时间，撰成《宋元学案》一百卷。此书与《明儒学案》比较，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更注意人物之间的师承传授关系，凡所记人物，都注明其家学、门人、私淑以至再传、三传、四传和续传，对同一辈的人，又作讲友、同调、学侣的区分，以明学术思想之渊源、流变。又如：黄宗羲治史具有重当代史的特点，他收集、整理了大量明代史料，选编成《明文案》二百七卷，后来扩编为《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又从中精选成《明文授读》六十二卷。他有志撰写明史，曾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据全祖望说，黄宗羲现存有关南明历史的著作《赣州失事》、《绍武争立纪》、《四明山寨记》、《舟山兴废》等，都是其中的内容。继承黄宗羲这一史学特点最突出的是万斯同。他以布衣身份修明史，在馆十余年，作了大量工作，最后卒于明史馆，真正做到了"以任故国之史事报故国"。章学诚不仅擅长史学，并且从理论上作了总结，提出了"六经皆史"、"史学所以经世"，史学家除具有才、学、识之外，还必须具备史德等史学理论，成为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出现之前，古代史学理论的高峰。因而，梁启超称他为"历史哲学家"，并非为溢美之词。

正因为浙东学派在史学上作出了重大贡献，所以学术界长期以来称这个学派为"浙东史学派"。虽说这样的名称未免有"偏颇"之嫌，但也确乎反映了清代浙东学派擅长史学的特色。

综上所述，黄宗羲创立并长期主讲的甬上证人书院，培育了清代浙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孕育了这个学派以注重学术经世致用与擅长史学为基本特征的学术风格。因此，我们说，黄宗羲在甬上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是清代浙东学派得以形成的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

①万言《管村文钞内编》卷二，《绿竹芦诗草序》

②关于这次求学活动的时间，万言在《寄陈怡庭二首》的诗序中，认为是在"乙巳春"，即康熙四年(1665)春，后来全祖望在《续甬上耆旧诗》、黄炳垕在《黄梨洲先生年谱》中均采此说。近年方祖猷先生综合各种记载，认为应该是在康熙六年(1667年)(详见《黄宗羲与文昌社》一文，载《黄宗羲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03—504页)，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至于求学人数，实际应为27人。

③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④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甬上证人书院记》。

⑤⑧⑨李邺嗣《杲堂文钞》卷三，《送万充宗授经西陵记》。

⑥郑梁《寒村杂录》卷一，《寒村诗文集》。 (下转第93页)

⑯李富孙《鹤征录》卷一。
⑱汪由敦《松泉文集》卷九，《答明史馆某论史事书》。
⑲《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百二十二。
⑳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九，《蒋君西圃墓志铭》。
㉑陆奎勋《陆堂文集》卷十一，《与同馆论史事书》。
㉔邵晋涵《南江文钞》卷三，《明史提要》。
㉕㉗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一，《明史》。
㉖《明史》卷三百零九，《流贼传》。
㉘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
㉙戴名世《南山集》卷五，《与余生书》。
㉚曹溶《倦圃先生尺牍》卷上，《与徐健庵》。
㉝毛奇龄《西河合集·史馆兴辍录》。
㉞《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四，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己卯谕。
㉟《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十八，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制文。
㊱《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十八，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壬戌。
㊲徐乾学《憺园文集》卷十四，《修史条议》。
㊴《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史料》(稿本)，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六日广西巡抚熊学鹏奏折。
㊵鲁迅《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

(上接第77页)
⑦万言《管村文钞内编》卷一，《郑禹梅制义序》。
⑩⑭《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2、232页。
⑪详见拙作《黄宗羲甬上学生考》，载《宁波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⑫《黄宗羲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页。
⑬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
⑮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本，第304，31页。
⑯⑰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